

历史学研究

# 论五四前后的世界主义<sup>\*</sup>

郑大华<sup>1,2</sup>, 马 英<sup>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5; 2.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受一战影响,源于西方的世界主义在 20 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渐成一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群,作为活跃于彼时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三大政治力量,都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世界主义思想倾向。于政治观上言之,他们世界主义虽各有所张,然亦显见其相类之处,或谓为原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意识在中国具体情势下之调整,其世界主义背后的深沉国家关怀清晰可见。

**关键词:**五四前后;世界主义;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6-0032-09

**作者简介:**郑大华(1956-),男,湖南永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导。

马 英,山东菏泽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生。

世界主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斯多葛派,此派提倡人类乃一整体,主张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世界国家,世界乃每一个人的祖国。后经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动,世界主义思想已日臻成熟,到了近代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世界主义传入中国是在 20 世纪初,到了五四前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认为自己不仅要做一个中国人,而且还要做一个世界公民,他们纷纷发表文章,介绍、宣传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并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的世界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人物的世界主义思想研究,主要有耿云志的《梁启超的世界主义与个性主义》(《文史哲》2004 年第 3 期);罗志田的《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桑兵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响应》(《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方宁的《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世界主义思想》(《上海

党史与党建》,2009 年 3 月);喻大华、李孝君的《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情怀》(《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等;二是对世界主义思潮尤其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陈玉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书屋》2004 年第 5 期);刘瑶、吕丽莉的《20 世纪初期中国世界主义思潮研究》(《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9 年第 2 期);许纪霖的《五四运动:世界主义的幻灭》(《环球财经》,2009 年第 6 期)等。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的世界主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都不是对五四前后的世界主义的专题研究,虽然刘瑶、吕丽莉的《20 世纪初期中国世界主义思潮研究》和许纪霖的《五四运动:世界主义的幻灭》涉及到五时前后的世界主义,然而前文只是把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作为 20 世纪初期中国世界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加以论述的;后文主要论述了五四时期的几对关系,如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世界主义与个性主义、公理主义与强权主义、目标与手段、互助与竞争。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五四

\* 收稿日期:2011-10-20

前后的世界主义作进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世界主义思潮的兴起

世界主义源于西方,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成为一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世界主义之所以兴起于五四前后,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的联系到一起,这为国人感受世界提供了一次切身的体验,国人世界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世界主义的兴起;二是当时国人将欧战爆发的原因归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国人呼唤新文明,这种新的文明就是世界主义。

首先就第一个方面来看,国与国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共同关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共同关系更加密切起来。陈独秀这样形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sup>[1]</sup>中国本属于远离战场的东亚地区,不受战争牵连,但实际结果中国却深受战祸的影响和危害。战争爆发后,俄国即由西伯利亚调兵10万进驻北满及海参威,对中国东北极有侵吞之意。日本则乘欧洲列强正忙于欧战、无暇顾及远东之机,想对中国趁火打劫:“日本在东方为英之同盟国,苟英德开战,则战事将蔓延于东亚之属地,而日本之助英以攻德,亦不难推测而知,故战讯遥传,香港、青岛、西贡诸港,汲汲为防御之预备。我国于列强之间,虽无特别之关系,完全居中立地位,然狡焉思启之心,何国蔑有,其乘机而起攫利益取霸权犯中立者,亦不可不为先事之防乎。”<sup>[2]</sup>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輿致电北京政府“日本唯恐欧洲不战,日置益且言战则大妙其跃跃欲逞不言可喻”,表示了对日本出兵中国的担忧,这种担忧不久便成为一种事实。1914年8月6日,北京政府依照国际公法,宣布局外中立。此时日本已决定借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力东顾的时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8月7日夜,日本内阁通过了参战决定。8月8日,日本以英日同盟通知英国决定对德宣战,但它并不是要攻打德国本国,而是攻打德国人在山东的租借地青岛。9月3日,两万日军及少数英军在龙口及莱州登陆,并在此之前占领了胶济铁路及济南。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战火

已经延伸到中国,中国在此情况下被迫与世界发生联系。“中国今日而欲免其外患,及保持其生存与独立,自非赖各睦谊国及非睦谊国之个人相助不为功。盖立国于今日之世界,无论何国,原不能以孤立而谋存在,必互相往来,互有关系。”<sup>[3]</sup>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中不无感慨的说,“今之世界,一国不幸,他国亦受其弊”。<sup>[4]</sup>

其次从第二个方面来考察。欧战的导火索为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刺杀,由此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初期国人研究欧战爆发原因时就将其归结为“民族主义所激动”。范石渠在《近世民族主义争斗》一文中写到:“近年以来,民族的精神最为活跃。其发生国际重大事件者……见诸于波斯尼亚及塞尔维亚人之暗杀奥国太子而致酿成今日欧洲之大乱,此天下所共知也。”他指出,“波斯尼亚及塞尔维亚人暗杀奥国太子之事,此其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大塞尔维亚主义,也是泛斯拉夫主义的一种。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大塞尔维亚主义气焰益张,他们担心奥匈皇储继位会给大塞尔维亚运动带来打击,“抱大塞尔维亚主义之人,又安得不断行其暗杀也哉。”<sup>[5]</sup>章锡琛在《德意志思想关于民族主义之变调》一文中也认为,“民族主义为多数国民之理想,凡一国特有之理想,恒为国民热烈之情火,使之踊跃兴奋,民族主义之理想则其尤也”。<sup>[6]</sup>民族主义渐次膨胀,便极易走向极端。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杜亚泉称之为“偏狭之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国民心中“固结而不可解”,最终“以民族之誇负心,酿成民族战争”。他将战争分为东欧与西欧两部分,认为“今日东欧之战争,斯拉夫民族与日耳曼民族之战争,西欧之战争,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之战争也”。<sup>[7]</sup>

有的人将这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称之为种族主义,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就在于种族间的冲突。《欧战之远因》一文指出: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大斯拉夫种族主义与德人为代表的大日耳曼种族主义之竞争,“亦即为今日大战争之胚胎。”<sup>[8]</sup>《平和与战争》一文也认为:“此次欧洲之战,亦不过斯拉夫人种与日耳曼人种之生存竞争所致者也。”<sup>[9]</sup>《欧洲战祸之原因》一文对战祸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此次欧洲战事实白种各族之权利竞争也,盎格鲁撒逊人,条顿人,斯拉夫人,拉丁人,各欲握世界之霸权,故酿成此古所未有之大惨剧”,“盖人种战争之势,其成久矣。”<sup>[10]</sup>

在反思欧战的基础上,人们呼唤新文明的产生。杜亚泉就明确指出,“今次大战终结,实有旧文明死亡,新文明产生之时期”,在他看来,西方现代文明早已走向没落,“当欧战发生时‘世人已有欧洲现代文明没落之想象’。”<sup>[11]</sup>人们向往和平,期待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并对这种新文明进行了预测。萧公弼认为,“所谓新文明者,必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且有牢笼世界鼓舞人心之能力,始有新文明之价值焉。”<sup>[12]</sup>张东荪把这种新文明归结为四特点:“一、思想上、道德上必定以社会为本位;二、经济上必定以分配为本位;三、制度上必定以世界为本位;四、社会上必定没有阶级的等次,虽不能绝对,也须近于水平线。”<sup>[13]</sup>尽管他们对这种新文明的认识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这种新文明是世界主义的文明。用萧公弼的话说:这种新文明“‘秩序进化的世界主义者是也’”。蒋梦麟同样认为战后产生的这种新文明是世界主义的,但它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之上,是“国家主义以外将兼及世界主义也”。因为“国家主义根据于爱乡土之心,人各爱其乡土,开辟其富源,增进其幸福,非世界文明进步之基础乎?故不知爱护其乡者不知爱护其国,不知爱护其国者,不知爱护世界,故善用之国家主义实世界主义之基础,不善用之则足以酿成无穷之战祸。此次大战之后,国家主义将略改其方向,而世界主义将有萌芽之希望”。<sup>[14]</sup>更有国人认为这种世界主义的新文明会持续到整个21世纪,并引用剑桥大学锡麦氏的话,“民族主义者,十九世纪政治史之关键也”,吾人今广其义曰,“四海同胞主义者,二十世纪以后政治史之关键也”。<sup>[15]</sup>其实早在战争初期,国人对世界主义表达了极其渴盼的心情,“余因是起而希望于二十世纪之将来,大同之希望”。<sup>[16]</sup>这种大同希望就是一种世界主义的希望。

总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战后人们纷纷表示出了对世界主义的欢迎,以至于形成一股宣传世界主义的潮流。孙中山1924年在演讲《民族主义》时就多次提到了这种现象。他说:“我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近来讲新文化的学生,也提倡世界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不合世界潮流”。由此可见世界主义在战后的中国的影响。

## 二、国内三大政治力量与世界主义

五四前后,除北洋军阀外,当时活跃于中国思

想文化舞台的主要有三大政治力量,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的思想倾向。

###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与世界主义

陈独秀还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其思想中就已经具有了世界主义的因素。1915年9月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当代青年应该具有的品质提出了六点建议,其中一条就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因为在他看来,现在的国家与国家之间联系非常密切,“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以前那种闭关锁国的精神已经过时,现在国民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意识,这种世界意识在现在这种时代是极其重要的,“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sup>[17]</sup>成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之后,陈独秀的世界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1920年1月1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一文,阐述了他的世界主义观点,不过陈独秀是在反对国家主义基础上提倡世界主义的,认为“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什么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才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是一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在他看来,国家并不是一个最完备的社会组织,不能防止弱肉强食和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有时候还是导致战争纷争的源泉,因此国家的存在只是暂时的,将来的世界必将趋于一种无国界的状态,“今日之科学思想,已无国界,而异日之利益,亦无国界”。<sup>[17]</sup>他十分赞同陶孟和的“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认为所谓的“世界大同”,也就是“世界主义”。<sup>[17](P723)</sup>

瞿秋白主张劳动者建立“联邦国家”。这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普遍怀有的信念。然而瞿秋白所提倡的世界主义是无国界、无阶级,并非是无政府。这是世界主义不同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所在。他认为“国家的组织固然是种种罪恶的表现。然而她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制度,她是代表一阶级的统治权。若要反对国家,首先便应当反对那些根性上不能没有国家的阶级制度。然后从客观的经济制度上求那怎样消灭阶级的方法,阶级消灭,国家才能消灭。”<sup>[18](P513)</sup>这和陈独秀的观点是一致的,陈独秀

提出“工人无国界”，但同时又认为国界不能消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只能“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可将他抛弃不用”。<sup>[17](P367-368)</sup>瞿秋白还肯定各国经济走向世界化的趋势，认为这种趋势“本身确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因为它不仅大大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推进了“各民族之互相依赖及各地域之经济统一的过程”，使得各民族“日益趋于同化”，“各自消灭他的特殊性”。<sup>[18](P678)</sup>

萧楚女也对世界主义进行过阐述，他区分了两种世界主义：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认为这两种世界主义，实质上都是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以每个具体的个人为单位，体现了人类“抽象的平等精神”，而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则是以神为本位。这两种世界主义虽然实质截然不同，但它们主张“消灭国界”。萧楚女对“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等人因反对基督教而反对世界主义提出了批评，说他们是株连以人类统治人类的真世界主义。同时他也反国家主义者为了提倡民族主义来反对世界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并行不悖的东西”。<sup>[19]</sup>

共产主义与世界主义确有相似之处，二者都倡导“万民同体”、“世界一家”，倡导全世界的人类走共同道路。共产主义相信在世界大同中，血统、血缘、地域关系终将会被打破，国家终将走向灭亡，但对将来是否存有政府并未给予否定。世界主义者也认为国界终将消失，人类最终会由一个世界政府来统治，人类的演进不可能彻底消灭政府，因而世界政府的存在有它必要性。共产主义与世界主义这些相同性，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大多也是世界主义者的根本原因。

## (二) 国民党人与世界主义

其实早在欧战之前孙中山就已经具有了某些世界主义的意识。1912年他在《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指出，国家是由团体组成的，随着世运的变迁，小团体逐渐演变成大团体，这就是“蒙昧之世，小国林立，以千万计，今则世界强国大国仅六、七耳”的原因，由此进一步发展，大的团体逐渐演变成一个团体，“进而成世界唯一大国”，这就是所谓的“大同之世”。进入大同之世之后国界就会泯灭消除。尽管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欲泯除国界而进于大同，其道非易”，但他对这种“大同之世”充满信心，“今世界先觉之士，鼓

吹大同主义者已不乏其人”，只要我们将这种大同主义扩充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sup>[20](P439,440)</sup>1913年2月23日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又指出，优胜劣汰学说的提出必会导致“国家界限尚严”，“国与国之间，不能无争”，这样就会导致战争的爆发。所以他主张多讲“世界大同”，并且反复强调：“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sup>[21](P25)</sup>

然而欧战结束后，孙中山对世界主义的看法有了改变，他认为在中国的领土、主权都没有完全独立的情况下，不适宜提倡世界主义，“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所以，在当下中国要提倡的不是世界主义，而是民族主义，“中国欲倡世界主义，必先恢复主权与列强平等；欲求与列强平等，又不可不先整顿内治。所以众‘伙计’今日要行积极的民族主义。”<sup>[22](P558)</sup>如果民族主义不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可能发达。他对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说法——“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一个主义究竟好不好，主要是要看它合不合我们用，合我们的用便是好的主义，不合我们的用便是不好的主义；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的主义，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的主义。现在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世界主义，其实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所以中国目前不仅不宜提倡世界主义，相反“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sup>[23](P216-217, 223-226)</sup>

孙中山虽然极力主张民族主义，但他并不否认世界主义，他把世界主义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而民族主义则是实现这种目标的工具。孙中山接受民族自决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实现独立自主的新观念，主张用民族主义实现内部的自我联合，再联合世界上所有的弱小民族，共同用公理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

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就此而言,民族主义是实现世界主义的基础,“像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sup>[23](P220,231)</sup>

戴季陶也早在辛亥时期就接触过世界主义,并对世界主义的观念相当认同。不过他是从社会主义角度来认同世界主义的,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天然的世界主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戴季陶对社会主义就是天然的世界主义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强调,认为在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已经联成不可分的关系时,从前那种各国家对立的制度和少数资本家独占生产机关的制度,同时发生破绽,“由国家生出的破绽,就是世界主义的趋向。由资本主义生产制生出的破绽,就是社会主义的趋向。”各种国际组织的成立,说明国家对于世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而世界主义可以解决的人类社会产生的问题,“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就此而言,中国的问题也应该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面求得解决。<sup>[24]</sup>

蔡元培是最早提倡世界主义的国民党人。1902年,他在评论日英联盟时,就认为日英联盟的成立与东方有极大的关系,“此举或当为世界主义之发端”,老的东方大地由此将会产生世界主义的萌芽,并希望中国“破黄白之级,通欧亚之邮,以世界主义扩民族主义之狭见”。<sup>[25](P382,383)</sup> 1912年蔡元培留学德国期间,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一书,认为科学与美术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最完全不受他种社会之囿域,而合于世界主义者。”<sup>[26](P290)</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战胜同盟国,他认为是世界主义战胜了国家主义,并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人们要消灭种族偏见,发展大同主义,亦就是世界主义。<sup>[27](P460)</sup>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当时北京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大学生创办了一份《国民杂志》,蔡元培不仅予以经费上的大办支持,而且亲自为之作序。他肯定学生爱国热忱的同时,又希望他们要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不仅要认识到自己是中国国民的一分子,同时亦也认识到

自己还是“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sup>[27](P531)</sup>

### (三)研究系人与世界主义

欧战的爆发给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人们纷纷企盼新的文明的产生,到战争快要结束时,类似的见解已相当普遍了。研究系主办的《晨报》社认为,“世界大战既终,国内争斗亦息,平和之声,弥漫大地。由此而新思想、新潮流、新团体、新事业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在世界开一新纪元,在吾国辟一生命,果能顺应时变,力图自新,则起死回生之机,又未必不在今日。”<sup>[28]</sup>

欧战结束后就会产生新的希望,这种“新希望”的基础何在?《晨报》的梁秋水代表了当时的很多人的想法。他说:“世界大战告终,和平会议开幕”,从欧洲到远东的“一切国际问题,胥将由此会议而解决之”。我中华民族,抑何独不然,故吾人对于此空前绝后之和平会议,自不能不有相当之希望”,他期待着“从此将入国际历史之新时代”。这一“新时代”的特点,就是“世界主义”取代“国家主义”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sup>[29]</sup>

研究系的主要成员把实现“世界主义”的理想更多的寄托在了国际联盟的建立上。熊希龄、梁启超、张謇、汪大燮、林长民、梁士诒等人在《国际联盟同志会宣言》中表达了对国际联盟的希望,在他们看来,国际联盟的建立可以使“战事自兹永免”,可以使人类永久保持和平,而且国际联盟的思想和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相符合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夙以大同为至善”,大同者,天下一家,“即国际联盟圆满之境也”。中国民族好和平,恶战争,“盖涵濡于数千年圣哲教训之所致,尤与国际联盟之精神相符也”。他们发起成立国际联盟同志会的目的,就是要“与他国同志互通声气,彼此提携,以期达我大同之理想。”<sup>[30]</sup>

作为研究系的领袖,梁启超早年曾追随康有为讲“大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设计有“万国大同主义时代”,他在1901年10月12日、10月22日《清议报》第94、95册《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对欧洲的国家思想演变作了阐述,认为考察欧洲国家思想过去、现在、未来变迁的轨迹大致是,过去是家族主义时代、酋长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演变,现在是民族主义时代、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过度,而未来则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他指出现在的欧美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而亚洲则是“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我们未来的世界就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也就是

世界主义时代。<sup>[31](P189)</su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一度崇尚过德国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崇尚“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德国被“互助”的协约国打败,这引起了梁启超对“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反思,认为“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大战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把自己凌驾于世界之上,任何国家做出的任何一项外交政策都要顾及别国的利益,要有一种普世关怀。这是对世界各国提出的要求,而对于个人来讲,他认为个人要意识到其“一面为构造国家之一份子,一面又为世界人类之一个人”,<sup>[32](P605)</sup>而作为世界人类一份子,不能只为自己国家考虑,还要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要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sup>[33](P2978)</sup>

### 三、各派政治力量对世界主义认识的同与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同的政治文化派别从各自的立场和政见出发,向全社会传达着这样一个共同的信息,即:和平与大同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即国家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主义的时代正在来临。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但是他们对世界主义的认识又有其相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世界主义的提倡多限于政治层面

中国知识界对世界主义的介绍大多是政治层面的,主要集中在建立国际联盟方面,尤其是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提出,使很多人对威尔逊抱有极大的期望,李大钊指出“然吾人终信和平之曙光,必发于太平洋之东岸,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sup>[34](P477)</sup>人们都认为战后建立国际联盟是必然趋势,国民党人朱执信认为,“国家非最后之生活形式,则国家主义亦不能为永久之生活标准”,在国家之上还有更高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国际联盟。李大钊也持相同观点,他在《〈国体与青年〉跋》中认为,“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 Democracy 不是仅在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更有人指出,国际联盟的主张符合我国古代先哲思想。“中国之政治思想,夙以大同为至善,

大同者,天下一家,即国际联盟圆满之境地。中国民族好和平、恶战争,盖涵濡于数千年圣哲教训之所至,尤与国际联盟之精神相符也”。<sup>[35]</sup>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学者为大同。大同者,四海一家之意,国际大同盟,功成完满,即达此域。故中国人对于国际大同盟之赞成必不逊于他人也”。<sup>[32](P801)</sup>

在中国知识界看来,世界主义符合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梁启超就曾指出:“我国往哲所训,皆以‘治国平天下’相次连举,而政治家最终之目的,必在‘平天下’。盖我国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是所谓天下也。换言之,则我中国人之思想,谓政治之为物,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也。在当时以中国交通所及一隅之地指为世界指其人为人类全体,由今观之,诚觉可笑。然此种世界主义之发挥光大,卒为我中国全部永远统一之根因。而其进行之路径,则与吾侪今日所渴望之国际联盟,其性质颇有相类者。”<sup>[32](P743)</sup>孙中山也认为“道德家必愿世界大同”,他把中国这种世界主义的提倡和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联系起来,认为现在中国提倡的世界主义和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大同”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sup>[36](P36)</sup>他在演讲民族主义第三讲时指出,“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所讲的天下主义”。<sup>[23](P216-217)</sup>

国人对世界主义的提倡在欧战后出现了一股潮流,但是这些主张仅仅局限在政治方面,虽然也有杜亚泉提出“经济协力主义”,<sup>[37](P21)</sup>蔡元培提出的“战前教育偏于国家主义,战后教育必当偏于世界主义”,<sup>[27](P592)</sup>但时人的世界主义目光还是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

#### (二)具有世界公民意识

世界主义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无国界。战后宣传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大都具有一种“大我”、“小我”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中国国民,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还是世界公民。傅斯年就说过,“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之间的一切阶级,若家庭、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养一个真我”。<sup>[38](P297)</sup>他又说,“我们在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还是世界中的市民。在现在的时代论

来,世界的团结,还是要以民族为单位。所以我们对于公众的责任是两面的,一面是一国的市民,一面是世界的市民。”<sup>[38](P384-388)</sup>国民党人朱执信也指出,除了是国家之一分子,人同时还是人类之一分子。人须自觉其对于全人类之任务,自觉其人生之目的。人生之目的是以个体有限的生命为人类无涯之进化作出贡献。<sup>[39](P402-403)</sup>蔡元培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在《〈国民杂志〉序》中对现在国民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他忠告现代的年轻人,应该把我们的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把胸怀开得宽广一些,把人类的利益视作比国家的利益更高的标准。梁启超的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比较早,欧战爆发不久,他就在《申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欧战之后我国国民思想必有一次大的变迁,近世的世界思想日益发挥,国家主义必走向衰落,“惟人生在此一面为构造国家之一分子,一面又为世界人类之一个人”。欧战结束后,他认为战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尽快挽救建设起来,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并不是难事,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的责任也不仅仅在于此,“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全人类有所贡献。因为人类才是‘自我’的极量,我要发展‘自我’就需向这条路努力前进”。

### (三)世界主义关怀中的爱国主义

无论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还是国民党人或研究系知识分子,其世界主义的背后都蕴含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结。梁启超虽然倡导世界主义,但他认为世界主义在近期内是不能实现的,“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象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就此说来,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sup>[40](P2985)</sup>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爱国,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尽快把国家建设的强大。孙中山对国内青年盲目的崇拜世界主义提出批评,他指出世界主义好不好主要看这种主义是否实用于中国,“如果这个主义是好的,为什么中国已经亡国,民族主义就要灭亡呢?”,世界主义在现阶段不适合中国,因为“世界主义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

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sup>[23](P220)</sup>他认为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巩固民族主义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巩固,世界主义就不可能发达。蔡元培同样认为欧战之后互助论将得到提倡,世界主义有所发展,“今日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过渡时代”,他希望国人“同时抱爱国心与人道主义”,在这种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过渡时代,“不能不调剂之,使其不相冲突也”。<sup>[27](P49)</sup>这充分说明蔡元培的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并重的。陈独秀曾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反对狭义的爱国主义,提倡理性的爱国主义,主张中国人应该“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努力,而这个团体就是对“世界大同”的积极响应。

由于各个文化政治派别的立场以及政见不同,各个派别的世界主义的提倡不尽相同,即使同一派别之内,不同知识分子对世界主义的理解也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对世界主义性质的认识不同上。

早期共产主义者均反对国家主义,倡导“世界大同主义”、“世界一家主义”,主张建设联邦国家,进入无阶级、无国界的社会。李大钊作曾号召打破“国家界限”,“不要常备军”,“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sup>[41]</sup>这和瞿秋白所说的“从劳动者的联邦国家……进于无国界、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相同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世界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相近之处,二者都倡导“万民同体”、“世界一家”,全人类走共同道路,世界主义的很多观点符合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崇拜的世界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是体现人类“抽象的平等精神”的世界主义。萧楚女就曾把世界主义分为两类,其一是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其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才是真的世界主义,我们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来打破国家、阶级、种族的界限,建立平等的世界。

以孙中山为代表一些国民党人从民族主义出发对世界主义提出过批评。孙中山认为中国提倡世界主义的人们是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蛊惑,他们所提倡的世界主义是和恢复民族主义精神、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相对立的,这种世界主义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我们应当说服青年人免受西方世界主义的煽惑。他指出“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

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他进一步指出,“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sup>[23](P226)</sup>按照孙中山的理解,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我们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压迫人的民族和国家,并且用虚伪的“世界主义”来反对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的复兴,假如我们丢掉民族主义这个“人类图生存的宝贝”,我们就会被淘汰,就不能生存,就会在打着“世界主义”幌子的强权侵略面前失去抵抗的意识和能力。蔡元培虽然自清末以来就提倡世界主义的忠实信徒,但后来他也接受的孙中山的主张:“中国受了世界主义的欺骗,所以把民族主义失掉。所以我们不谈世界主义,谈民族主义;民族达到了,才好谈世界主义。”<sup>[42](P412)</sup>

研究系的梁启超、丁文江在欧战前后就宣传过世界主义,但是他们集中介绍世界主义还是在罗素来华讲学期间。罗素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一贯信奉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反对民族战争,尤其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暴露出来的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问题做出深刻的反省,认为“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人们将本民族与他民族对立起来的一种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是一切侵略和争端的动因,只要这种民族主义存在,民族之间的争斗就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医治民族主义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人类自觉地组织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世界政府”。罗素的讲演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受到研究系人的欢迎,梁启超在欢迎罗素的演讲中说:“有一个哲学家,他的手指有化万物为黄金的能力”。“中国人……不以得着所变的黄金为满足,只想得着那个黄金的指头。”<sup>[43](P2)</sup>梁启超所讲的这个哲学家就是罗素。自认为从罗素那里得着了“化万物为黄金的指头”的梁启超等人,配合着罗素的讲演热情地宣传起世界主义来。

#### 四、结语

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浩劫,但同时欧战也带

来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融合,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欧战无疑带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大契机,世界主义正是在此时被广泛地传播开来。

如果说“五四前后的世界主义”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政治倾向、思想情绪或思想态度”,那么,世界主义到底是对什么问题或是哪种现象持有的政治倾向、思想情绪或思想态度呢?欧战后中国的世界主义其实是国人特别是知识界对其原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意识的一个调整。各个派别之间的争论也是基于不同的民族观、国家观展开的,其世界主义的背后蕴含着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怀。正如胡适对世界主义的界说:“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sup>[44](P200)</sup>确实,在近代中国,国家、民族危亡的巨大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反复地思考、审视本民族的地位和出路,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纠葛中寻求最终的解决方案。

在 21 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重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主义思想,思考着前人曾经思考过、讨论过、困惑过的问题,在前人的思想中吸取智慧,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世界主义的诠释,对在今日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以世界的眼光、开放的态度迎接民族的昌盛、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矛盾也有所借鉴。

#### 参考文献:

- [1] 陈独秀. 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1915 年 9 月.
- [2] 高劳. 欧洲大战争开始[J].《东方杂志》第 11 卷第 2 号,1914 年 8 月.
- [3] 内外时报:中国之以日抵日策[J].《东方杂志》第 12 卷第 3 号,1915 年 3 月.
- [4] 伦父. 社会协力主义[J].《东方杂志》第 12 卷第 1 号,1915 年 1 月.
- [5] 范石渠. 近世民族主义之争斗[J].《大中华杂志》第 1 卷第 4 期,1915 年 4 月 20 日.
- [6] 章锡琛. 德意志思想关于民族主义之变调[J].《东方杂志》第 13 卷第 11 号,1916 年 11 月 10 日.
- [7] 伦父. 大战争与中国[J].《东方杂志》第 11 卷第 3 卷,1914 年 9 月 1 日.
- [8] 孔涤鑫. 欧战之远因[J].《学生》第 1 卷第 5 期.
- [9] 内外时报:平和与战争(录大共和日报)[J].《东方杂



- 志》第11卷第6号,1914年12月1日.
- [10] 夏元璠. 欧洲战祸之原因[J].《东方杂志》第12卷第2号,1915年2月.
- [11] 伦父. 大战终结后国人觉悟如何[J].《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
- [12] 萧公弼. 大战争后之新文明[J].《学生杂志》第3卷第10号.
- [13] 东荪. 第三种文明[J].《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 [14] 蒋梦麟. 欧战后世界之思想及教育[J].《教育杂志》第10卷第5号.
- [15] 世界的中国问题与其解决方法[J].《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
- [16] 陈弈民. 余之所希望者[J].《东方杂志》第12卷第6号,1915年6月.
- [17] 陈独秀. 独秀文存[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 [18]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政治篇: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9] 楚女. 上帝底世界和人类的世界[J].《中国青年》第18期,1924年2月16日.
- [20]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2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1]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3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2]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5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3]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9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4] 戴季陶. 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J].《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 [25]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第1卷[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26]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第2卷[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27]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第3卷[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28] 送岁词;祝新[N]. 晨报,1918-12-31(2);1919-01-05(2).
- [29] 梁秋水. 庚子赔款问题(一)[N]. 晨报,1918-12-01(2).
- [30] 国际联盟同志会宣言[N]. 上海申报,1919-02-13.
- [31] 梁启超. 梁启超选集[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3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外文:中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3]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第10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34]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35] 内外时报:国际联盟同志会缘起[J].《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
- [36]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7] 许纪霖. 田建业编. 杜亚泉文存[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38]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第1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 [39] 朱执信. 朱执信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0]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第5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41] 李大钊. 新纪元[J].《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
- [42]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第5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3] 罗素五大讲演,社会结构学(附录二):少年中国之男女[M]. 北京:北京新知书社,1921.
- [44] 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陈伟)

## On Cosmopolitanism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ZHENG Da-hua<sup>1,2</sup> MA Ying<sup>2</sup>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5,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First World War, cosmopolitanism, originated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began to enter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gradually became a dominant ideological trend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arly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Chen Duxiu, and some Kuomintang members, represented by Sun Yat-sen, together with the intellectual groups represented by Liao Qichao, all showed an ideological trend of cosmopolitanism more or less. Though their political views were different to some extent in terms of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their deep concerns to the nation were noticeable under cosmopolitanism.

**Key word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osmopolitanism; Patriotism